

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与二元教育结构转变

朱镜德

【摘要】 在城乡基础、义务教育发展二元结构条件下,要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梦是困难的。在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由个体化转向家庭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为改变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格局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认为能否在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获得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是关键所在。

【关键词】 基础教育 义务教育 农民工子女

【作者】 朱镜德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数量巨大、比重奇高的农村学龄儿童不能像城市学龄儿童那样获得较高质量的基础、义务教育,是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重大障碍之一。相对于城市,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十分匮乏,这种教育发展的二元格局现象与经济结构的二元现象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要化解基础、义务教育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或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在教育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仅仅在农村探寻出路是不可能的,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将在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城市化发展及相关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一、现阶段中国基础、义务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

目前城乡基础、义务教育存在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差距。根据200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1年城乡小学义务教育生人均预算内经费分别是877.1元和558.4元,两者之比是1.6:1;初中则是1001.0元和666.7元,两者之比是1.5:1。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学校拖欠教师工资。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和教育厅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联合调查,有26.3%的校长反映2002年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湖北统计局网管中心,2003)。农村中小学校危房面积较大。虽然危房在全国中小学总校舍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在中西部农村问题严重,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10%~15%,个别地方超过20%。在师资方面,城市义务教育专任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比农村高;农村代课教师所占比重过大,贫困地区合格教师十分难寻。

城乡教育发展两极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为辍学率高,农村初中辍学率估计在20%以上。根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贫困地区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占60%左右(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其次是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太小。城市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重为43%强,而农村仅为8.4%。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还有15%的地区还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0.9%的儿童没有学上,11.4%的少年没有初中读,他们大多为农民的孩子。另外,一些农村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带有很强的突击性,验收标准低,基础十分脆弱(汝信等,2002)。

二、关于改变城乡教育发展二元结构的机制构建

如上所述,现阶段中国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结构现象相当明显。要改变这种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二元结构,就必须构建分子常规(甚至超常规)增长机制和分母减少机制。这里的分子是指农

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分母则是指分享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农村儿童少年。两者的变化决定着农村儿童少年人均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多寡和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质量。

分子常规增长机制是指,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增长能够与全国经济增长同步或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城市地区的同步(从而防止城乡教育发展差别的进一步扩大);分子的超常规增长则是指,(由于城乡在教育发展方面的两极分化)农村人均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增长幅度要大于城市地区人均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增长幅度,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在基础、义务教育资源方面的巨大差异。分母减少机制则是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不断增多的农村儿童少年进城求学,放弃分享由迁出地提供的基础、义务教育资源,从而(在分子存量和增量已定的条件下)提高农村儿童少年人均基础、义务教育资源水平;流出的儿童少年越多(分母减少越多),农村儿童少年人均教育资源就越多(本文假定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可获得主要由城市政府提供的基础、义务教育资源)。

(一) 分子常规(超常规)增长机制尚难形成

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分子常规增长机制似乎难以形成(更难以形成分子的超常规增长机制)。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分子)包括人(主要是教师)与物(教育经费)两个方面,现在来分别探讨。

1. 关于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相对于城市,农村的困难大得多。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杂费构成教育经费的主体部分,两者分别占教育经费来源的66%和16%;在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中央支出210.25亿元,地方支出2434.73亿元(国家统计局,2003)。教育事业费的构成表明,一个地区教育事业费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财政状况。然而,地方财政收入状况城乡差异巨大,与之相联系,城乡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差别也巨大。比如高城市化水平的上海市与低城市化水平的贵州省相比(见表1),由于前者的人均GDP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从而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人均学杂费也都大大高于后者,人均教育资源水平与人均GDP水平通常保持高度一致。在城乡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条件下,由人均GDP增长差异导致的人均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通过中央财政安排(或转移支付)来消除的,甚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能做到。

表1 2002年上海市与贵州省部分指标比较

	城市化水平* (%)	人均GDP (万元)	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 (元)	人均学费和杂费 (元)
上海市	88.3	3.33	944	202
贵州省	23.9	0.31	132	26
全国平均	36.1	0.82	238	58

注:*城市化水平为2000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200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2. 从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利益机制看,农村地方政府不仅财政虚弱^①,还缺乏增大农村基础、义务教育投资的强烈意愿。这是因为他们投资于基础、义务教育的产出可能将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失,比如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会考上大学、中专院校,从而永久地离开农村;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如中学毕业生)则更有可能产生外出打工的冲动^②。农村地方政府在基础、义务教育方面的大量投入似乎难以给当地经济带来明显的回报,倒是造

① 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03),目前县乡财政赤字十分严重,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赤字面35.6%。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情况更为严重。2002年,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截止2001年底,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与投入体制改革》(2002),目前中国县乡两级财政通常占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50%以上。

② 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1999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1.45%,比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43.27%低22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例比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例高了14个百分点;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例高8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政府网站 <http://www.molss.gov.cn>)。

成资金短缺、师资匮乏的农村地区为发达的城市地区培养人才的结果。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十分迅猛,高等教育扩张也极为强劲,农村地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速度流入城市。其势头越强劲,农村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回报可能就越少,从而投资教育的意愿也就越弱。

3.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青年教师具有明显的城市发展偏向。一般而言,受教育越多,其选择也就越多。劳动报酬、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往往为中青年教师所看重。而在这几个方面,城乡差距十分明显。事实上,目前大学毕业生,只要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恐怕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农村。目前农村面临的实际困难不仅是吸引人才难,留住人才也成为问题,而且教师流失现象似乎有趋于严重之势。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被调查的377所学校中有766名教师流失到县外,其中到武汉市的有132名,占17.2%;到沿海的有300名,占39.2%。从各年看,1991年以前平均每年不超过10名,1992~1999年逐年增多,到1999年达66名,2000年以后流失教师更多,2000年为104名,2001年为107名,2002年为102名,2003年1~5月就达42名(湖北省统计局网管中心,2003)。

(二) 构建分母减少机制对全面提升基础、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上所述,目前试图依靠大幅度增加农村教育资源供给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构建分母减少机制对缩小城乡教育发展的巨大差别乃至全面提升基础、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决定性意义。配第一克拉克法则早已揭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其人均收入也就越高。从目前的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与人均收入,而且与教育发展水平也明显呈正相关关系(见表2)。一般而言,城市的教育资源比之农村丰富得多,因此,城市化水平越高,接受教育的机会就越多,教育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实际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城市化水平很低时,教育发展水平很高。

表2 城市化与教育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

	1999年 城市化水平	1997年小学 净入学率	1997年中学 净入学率	1995年成人文盲率	
				女性	男性
低收入国家	31	76	51	45	24
中等收入国家	50	97	71	23	14
高收入国家	77	100	96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

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城市比农村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是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正是由于城乡在(包括教育资源在内为发展所必须的)人均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乡发展的

巨大差别,才形成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向城市迁移的冲动,从而推动经济后进国的城市化发展,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发展的一般模式(钱纳里,1988),几乎无一例外。换言之,如果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农村各类资源的人均水平都与城市相当,那么该国的城市化(乃至现代化)发展可能就会成为问题。

在城乡发展两极分化条件下,试图通过倾斜政策,超常规增加对农村的投入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是困难的,可能也不符合发展规律。在农村存量及增量教育资源已定的条件下,将更多的农村儿童少年由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迁移至资源丰富的城市地区接受基础、义务教育,会更为可行,也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潮流。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作为迁入地的城市有理由为他们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基础、义务教育资源,从而大大改善他们教育的状况吗?答案是肯定的。农民工子女应该并能够在迁入地获得基础、义务教育资源有三个重要理由:(1)当他们的父母或家人在迁入地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本文假定那些在城市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农民工将无法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更不可能承担其孩子在城市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时,不仅能够为迁入地创造财富,也能够增强迁入地企业的竞争力,这是因为(根

据劳动经济理论)农民工进城(即意味着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可有效地控制人工成本的快速增长(甚至降低迁入地的人工成本),从而有助于增强迁入地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据李嘉图模型,将工业工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利于企业利润(及产出的)增加,从而也有利于城市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目前中国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地,往往也是利税增长率比较高的地区。(2)当农民工子女长大并进入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后,由迁入地政府提供的相关基础、义务教育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将能够为迁入地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测算,全部劳动力头三年基础教育对 GDP 增长的贡献相当大,平均每一年的教育对 GDP 增长的贡献高达 9 个百分点;三年后教育的继续增加对 GDP 的贡献也能够达到 4 个百分点(World Bank,1991)。此外,目前中国的初等教育不仅私人回报率高,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分别为 18%和 14.4%(Hossian,1996)。(3)城市现有及不断增长的基础、义务教育资源能够满足现有及不断增加的农民工子女对基础、义务教育的需求。

目前中国构建分母减少机制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城迁移规模明显趋于增大,1997~2000 年,平均每年约增加 1 000 万,年均增长率高达两位数(蔡昉,2002)。另一方面,鉴于目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中国虽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 2003 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仅为 40.53%,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50%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新兴工业国韩国 78%的水平^①),城乡收入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②,宏观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一个强劲的势头,可以预期,中国城市外来劳动力不断增加的趋势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增强,流动人口中 18 岁以下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比例越来越高(国务院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3)。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2000 年,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发达地区,其流动儿童占迁入地儿童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分别为 22.79%,12.98%和 7.97%。另据《北京市 2001 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会报》显示,2001 年在北京的 328.1 万外来人口中,随亲家属占 13.4%,比 1997 年的 11.1%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其中,0~14 岁人口占 7.4%,比 1997 年的 6.7%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最近一些外来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新生儿中外来人口比重已经相当大。

鉴于城市地区,特别是像上海、北京那样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大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出生率往往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持续不断的乡-城人口迁移会不断提高流动儿童在迁入地所占比重。而随着该比重的逐步增大,城市教育体制变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都将大大增强。

三、城市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否满足农民工子女需求

有关分析表明,决定对农村人口引力的是城市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最大;农民工子女集中度也最高。那些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与大城市或特大、超大城市相比较低的中小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较小,从而农民工子女的集中度也较低。显然,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基础、义务教育资源需求的转移机制,十分有利于基础、义务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也十分有利于实现地区之间教育的平衡发展。

鉴于在基础、义务教育资源需求转移机制的作用下,上海、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因此,研究这两个城市现有及不断增长的教育资源供给是否能够满足现有及不断增多农民工子女的需求就具有代表性意义。

(一) 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存量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已出现大量富余

这种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富余主要表现为户口在当地的生源大幅度下降,如表 3 所示。2000 年北京小学生数量比 1995 年下降了大约 27%,实际减少人数 26.4 万。2003 年上海小学生数量比 1995 年

①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 2003 年《中国统计公告》和 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

② 据 2003 年《中国统计公告》,2003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 472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9.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 622 元,实际增长 4.3%。根据托达罗模型,城乡收入差别越大,乡-城迁移的冲动就越大。

减少45万(降幅为40%强);与之相联系,每个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也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降,目前已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2人)。另一方面,根据“五普”资料,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流动儿童(0~14岁)分别在25万和46万左右(其中学龄前儿童占40%以上)。

表3 北京和上海市小学在校学生数及每个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

	北 京			上 海				
	1995	1998	2000	1995	1998	2000	2002	2003
在校生(人)	1 007 000	920 000	743 000	1 097 800	961 400	788 600	672 400	648 300
每个专任教师 负担学生数(人)	16.5	13.7	12.1	20.1	19.4	17.8	16.6	—

注:根据历年北京和上海统计年鉴整理,其中2003年数据来自《2003上海统计公告》(www.stats-sh.gov.cn/2003shtj/tjxw/index.asp)。

通过上述两组数据的比较,便不难看出由于户口在本地的生源大幅度下降而富余出来的基础、义务教育资源是如此之大,流动儿童的现有规模似乎并不能构成对其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大的压力。

对农村人口引力较大的上海、北京等城市不仅在师资资源方面显示出富余,在人均教育经费方面,相对于全国人均水平,也明显富足(更大大高于农村人均水平)。2001年北京、上海市人均教育经费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320元)的3.5倍和3.6倍;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213元)的3.7倍和3.8倍(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2001年除了北京、上海人均教育经费名列前茅外,外来人口高度集中的广东省也有4个城市(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位于全国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前十名之列(国家统计局,2002)。

(二) 城市基础、义务教育资源的增长潜力巨大

关于城市特别是对农民工子女吸引力较高的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基础、义务教育资源供给增长的潜力,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1. 关于师资供给的潜力。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很快,城市地区(作为大中小学师资主要来源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供给基本不会出现多大困难,而且(如前所述)大中专毕业生择业区域基本局限于城市地区(愿意去农村工作的比例很低)。巧合的是,对主要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吸引力较大的、经济社会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恰恰也是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向往之地。不断增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不仅没有使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教师资源不堪负重,反而有助于缓解大学毕业生签约难矛盾,并间接地刺激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强劲扩张。因此,城市地区对流动儿童提供基础、义务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质量地普及基础、义务教育,也有利于城市地区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谓“一石两鸟”。

2. 从教育经费增长的潜力看。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或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近些年来,中国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从发展趋势看,城乡人均收入差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将取决于乡-城迁移^①。规模更大的乡-城迁

① 在中国城乡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差距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乡-城迁移,那么,与农业附加值较低增长率相联系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也必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如果不存在乡-城迁移,农民的收入则基本决定于农业附加值的生长,或即使存在乡-城迁移,但由于这种迁移的规模过小以至能够给农户家庭带来的收入增长赶不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那么城乡收入差别仍将会继续扩大。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收入)增长率的差距越大,那么(与防止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所要求的乡-城迁移规模就越大。因为在乡-城迁移规模已定的条件下,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增长率的差距越大,则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在城乡经济增长率或城乡工资收入增长率差距已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乡-城迁移规模越大,则城乡收入差别就越小。

移将有助于遏止城乡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使之有所缩小,但根据剩余劳动力两部门理论(Cillis等,1987),经济后进国在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农村的情况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鉴于目前中国城市化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可以预期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大大高于农村人均教育经费的现象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总之,高质量地普及基础、义务教育和强劲扩张(有质量保证的)高等教育是现阶段中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目标的两大支柱,两者应均衡发展。要实现这种均衡发展就必须逐步消除城乡基础、义务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问题,使农村数量巨大的学龄儿童少年能够获得有质量保证的正规教育。城乡基础、义务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早已存在,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在区域上的不匹配。在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资源常规或超常规增长机制难以形成条件下,减少在农村接受基础、义务教育儿童少年的数量将十分有利于农村人均教育资源的增加。与城市化进程同步,逐步将(基础、义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农村地区的儿童少年转移到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地区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在教育发展方面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导向是顺势而为,完全不需要政府动员;人们在利益机制驱动下终将会自觉行动。在其进程中,需要政府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对流动学龄儿童少年在迁入地接受基础、义务教育做好制度性安排,并创造相应宽松的政策环境条件,允许、支持和鼓励一切有条件(即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农民工送其子女进城入学,并为之提供与(户口在本地的)城市儿童少年同等的基础、义务教育待遇。

中国现已进入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并已开始出现大规模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的现象。这种发展趋势为改变教育发展两极分化格局,从而为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了重大机遇。如果现行教育制度能够得到有效重构,使不断增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地区与丰富的教育资源有效结合,形成系统机制,我们就能够抓住机遇,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2003):《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汝信等(2002):《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湖北省统计局网管中心(2003):《湖北省统计局联合省教育厅等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联合调查》(<http://www.stats-hb.gov.cn/document>)。
4. 国务院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3):《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报告》。
5.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2003):《如何化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国经济时报》,9月30日。
6. 钱纳里(1988):《发展的形式:1950~197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7. 国家统计局(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8. 蔡昉(2002):《2002: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Hossain(1996), Making An Equitable And Efficient Educ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China Social Sector Expenditure Review*, World Bank.
10. Cillis, et.al(1987),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London.
11. World Bank(199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2. Gerald M. Meier(1989),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

of the aged will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in the future.

Key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Mu Huaizhong ·44·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form has taken place in Liaoning province since 2001.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economic factors and support ability for old-age insurance reform, and analyzes 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experiment, providing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Some quantitative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in this article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old-age insura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 for supporting old-age insurance.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vided for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reform and its improvement.

Migrant Children Seeking Schools in Urban Areas and the Transition of Du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Zhu Jingde ·52·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utilize its human resources under the dual structure which divides basic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Now there is a new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a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based to family-based. This trend provides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a to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key point is to build a mechanism that can provide migrant children with basic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urban areas.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Migrant Children

Wang Di ·58·

The article is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the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t analyses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Chines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article takes data and document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makes deep analysis on current educational phenomena of school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author put forwards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regard to existing problems.

Employment Policy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Experiences from Some OECD Count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Yang Weiguo Wang Fei ·65·

Generally speak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the advantageous group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the process of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for them is unstable. Consider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OECD members, have formulated some special employment policies to support them. These policies aim at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more employment posts, encouraging graduates to take jobs in poor areas or to work in those industries with bad working condition, promoting graduates' employment ability, enhancing their employment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These policies have also considered that the job should match with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and to promote graduates' employment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n demand and supply. These policies undoubtedly will ha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Privatization of Pension Scheme

Liu Zilan ·72·

Since the 1980s Chile carried out reform on its old-age insurance privatization, some liberal scholars have been advocating the privatization model widely in the world. In China, some scholars also regard privatization the tendency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t present, some experimental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separating individual accounts from social pooling for old-age insurance in China. Many difficulties have been encountered during this process, which may lead to some un-confidence of people on the current institution. The choice of the pension scheme will fall into a pointless argument without correct theories. To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social security"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gives the concrete definition of old-age insurance privatization, and clarifies some plausible questions of privatization.